



屠呦呦：青蒿素造福人类

屠呦呦在工作中(翻拍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江南初夏，大树荫蔽之下，老宅里一小片黄花蒿在淅淅沥沥的梅雨滋润下愈发青翠，黄花蒿旁的少女雕像眼带笑意，仿佛与来往的游人述说着她与黄花蒿间奇妙的故事。

这是宁波市海曙区开明街26号姚宅内的一景，姚宅原是屠呦呦外祖父姚咏白和舅舅姚庆三的住宅，屠呦呦少年时代有10年时间与父母一起在此寓居。

屠呦呦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60多年来，她从未停止中医药研究实践。

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人类征服疟疾进程中的一小步，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20世纪60年代，在氯喹抗疟失效、人类饱受疟疾之害的情况下，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于1969年接受了国家疟疾防治项目“523”办公室艰巨的抗疟研究任务。屠呦呦担任中药抗疟组组长，从此与中药抗疟结下了不解之缘。

整理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她汇集了640余种治



茅以升：中国桥魂美名扬

茅以升在看书(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在江苏镇江的润扬大桥公园内，坐落着茅以升纪念馆。馆内展出茅以升遗物、生平事迹照片资料等，默默讲述着他坚定爱国、努力奋斗的一生。

茅以升，字唐臣，江苏镇江人，生于1896年，我国著名的桥梁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学毕业后，茅以升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1916年，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茅以升考取清华官费赴美国留学。1917年，茅以升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桥梁专业，获硕士学位；此后，又获卡耐基-梅隆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框架结构的次应力》的科学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

谢绝了国外好几家公司的重金聘请，怀着“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志向，茅以升毅然回国。他先后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南京东南大学工科教授兼主任，南京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兼教授，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等。

回国后的茅以升目睹的是：中国的江河湖海上，都是外国人造的桥。20世纪30年代，茅以升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主持修建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钱塘江大桥竣工不到三个月，杭州沦陷。为阻止日军进攻，茅以升亲手点燃了导火索，炸毁了这座饱含自己心血的大桥。

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任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

茅以升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的名字和新建的大桥一起留在祖国各地。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接受修建我国第一个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任务。这座大桥

是铁路公路两用的双层钢桁梁桥，大桥将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衔接起来，成为我国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并把武汉三镇联成一体，确保了我国南北地区铁路和公路网联成一体。

茅以升一生学桥、造桥、写桥。他在中国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主持编写了《中国古桥技术史》及《中国桥梁——古代至现代》(有日、英、法、德、西班牙五种文本)，著有《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一、二)《茅以升文集》等。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茅以升始终把入党作为自己毕生的理想和追求，并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已。1987年10月，茅以升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申请书中这样写道：“我已年逾九十，能为党工作之日日短，而要求入党之殷切愿望与日俱增。”

1989年11月12日，茅以升病逝。2019年，茅以升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茅老是中国的桥魂，镇江的骄傲。”镇江市政协副主席席未开宝说，镇江始终把传承发扬茅以升的精神作为科技立市、产业强市的精神支撑与发展指引。随着润扬大桥、五峰山长江大桥的建成通车，一代又一代镇江人不畏艰难、开拓创新，朝着产业强市目标加速跑起来，用扎扎实实的行动，让茅老对家乡的殷切期望成为美好的现实。

(记者邱冰清) 新华社南京5月31日电

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弥足珍贵的工作台历

老物件里看优良传统

在北京西郊的中央档案馆里，保存着近30本周恩来办公室工作台历。

这些珍贵的台历，时间跨度从1950年1月1日持续到1976年1月8日。轻轻翻阅台历，新中国前进的脚印跃然纸上，周恩来总理为党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令人动容。

1955年4月5日，距离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还有13天。打破中国外交孤立无援的局面，参加亚非会议至关重要。中国要发出什么声音?提出何种主张和立场?这些问题让周恩来总理夙兴夜寐。

当天的工作台上记录的日程：上午十时，国务院常务会议；下午一时，外交部党组会；原定晚九时，看赴印缅文化代表团汇报演出并与周而复、郑振铎等一谈，由于政治局会议而取消。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了万隆会议，提出“求同存异”方针，阐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国在万隆播下的友谊种子，结下了累累硕果。短短几年间，我国先后同尼泊尔等10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1964年10月16日，对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

当天的工作台历，记录了周恩来一天的紧密工作安排，一直持续到晚上11时，涉及内政、外交多个方面。其中一行分外瞩目：17：00，中央接见“东方红”演员。正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东方红》创作和演职人员时，周恩来总理向大家宣布了这个喜讯。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确诊罹患膀胱癌。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也未停止工作。

工作台历记录得清晰而明确：从1974年1月1日至6月1日住进医院准备接受手术期间，每日工作超过18小时，有的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的有5天……

一天连续工作长达20多个小时，这对普通人来说不可想象，而周恩来总理当时已经76岁，而且身患重病、正住院治疗……

(记者朱超)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阳光明媚，微风和煦，湖南省宁乡市花明楼镇炭子冲刘少奇同志故里游人如织，在文物馆里，参观者驻足在一辆油漆剥落、破损严重的吉普车前。

“1961年，为了解决国民经济面临的严重困难，党中央开展了一轮大调查、大研究。4月2日，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家乡湖南进行调查研究。他当时就是乘坐着这辆吉普车，在湖南农村奔波了44天。”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研究员周琦介绍说。

这辆苏式嘎斯69型吉普车，车身长3.67米，宽1.75米，高1.87米，原是湖南省委接待处用车。

1988年，湖南省委党校将它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文物馆里，另外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刘少奇使用过的望远镜，也见证了他回乡调查研究的经历。

据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文献资料记载，这架望远镜上宽11.2厘米，下宽21.5厘米，高18厘米，重690克。生产于20世纪50年代末，采用的材料为皮革、塑料、玻璃，颜色为黑色，由一个棕色猪腰形状的背式牛皮盒装着，盒内为绿色平镜。

“这是一件反映党和国家领导人革命实践活动的重要代表性文物。1987年，王光美将它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原馆长、党史专家罗雄说。

回乡调研期间，时年63岁的刘少奇行装简易，随身带着望远镜，坐着吉普车走遍一个个乡村。

经过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刘少奇收集了大量一手材料，对妨碍国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这辆吉普车，这架望远镜，是刘少奇同志返乡搞调研的见证物，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彰显了我们党的人民情怀，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罗雄说。

(记者刘良恒、史卫燕) 新华社长沙5月31日电

一图梦始响春雷

追梦长江筑安澜

走进位于深圳蛇口的招商局历史博物馆，一幅略显老旧的《香港明细全图》引人注目。

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风起南海，潮涌珠江。

作为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工商企业，招商局历经百年风云，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以香港为业务中心。

为进一步办好招商局，1978年6月，时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袁庚赴香港，进行广泛调查研究，起草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随后，袁庚被任命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

据招商局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陈丹丹介绍，招商局集团当时总资产仅剩1.3亿港元，非变革不能生存。袁庚等人提出，利用香港的资金、技术等有利条件，与内地土地、劳动力等优势结合起来，在广东宝安县建立工业区，对实现我国交通运输现代化和促进宝安的工业建设，以及对广东省的建设都将起积极的作用。

工业区选址何处?1979年1月31日，时任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与袁庚一道，带着这张涉及选址位置的《香港明细全图》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汇报。

李先念用铅笔在地图南头半岛上画了两条杠，建议招

商局集团自筹资金在这里开发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最终得到中央批准。

这张地图南头半岛上的铅笔印记，至今清晰可见。但几十平方公里的面积，袁庚测算开发支出超出招商局集团的承受能力，只接受了半岛尖上一块名为蛇口的地方。

袁庚后来回忆，在一片荒滩上开发一平方公里，总投资就得1亿元，虽然表面上看来气派不大，但是比较稳妥，可以避免投资太多、周期太长、规模过大的风险。

改革开放的“开山炮”轰鸣炸响。

第一个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工资制度，第一家由企业集团创办的银行，第一家股份制保险企业……在袁庚等人的推动下，蛇口开启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1981年底，这个巨型标语牌矗立在蛇口工业区最显眼的地方，很快传遍神州大地。

从蛇口工业区的探索起步，深圳经济特区得以建立。40多年来，从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深圳的地区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7亿元增至2020年的2.77万亿元，经济总量位居亚洲城市第五位。在盘点了全球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之后，英国《经济学人》用“若干成功典范中最突出的一个”来形容深圳。

(记者孙飞) 新华社深圳5月29日电

北京西郊，中央档案馆内，一封名为《国家计委关于三峡工程正式开工的通知》的文件静卧在文物柜中。纸上“三峡工程于1994年12月中旬正式开工建设”的短短数字，让人不由得回想起长江安澜的百年逐梦之旅。

“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潮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孙中山先生曾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中，首次提出在湖北宜昌一带修建三峡工程的设想。

彼时的长江流域，洪患肆虐成灾。在号称“九曲回肠”的荆江河道，泥沙不断沉积，形成“人在地上走，船在天上行”的奇幻险象。水高一尺，提高一丈，这里时刻上演着水与陆、生与死的攻防。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外专家多次开展三峡建坝考察，但放眼当时的中国，战火不熄、国似散沙，这些论证未能激起更大涟漪。

1956年，毛泽东来到长江，作诗展望三峡远景：“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面对大自然的伟力，水利人慎之又慎。察岩样，勘地形，测水文……三峡地质勘探历时40余年，在2个坝区、15个坝段、13条坝轴线上反复查勘论证。

“水是最严格的考官，它无孔不入。面对三峡工程，一定要持最严谨的科学态度。”时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潘家铮说。

一次次大论证，使得三峡工程的轮廓越辩越清晰。

1992年4月3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内，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正表决《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酝酿了七十余载的三峡之梦能否破茧而出?16时许，位于武汉的长江水利委员会内，寂然无声。“叮……”电话没来得及响出第二声，立即被接起——“通过了!”

刹那间，欢呼声四起，大楼飘下一条长长的标语——三峡工程功在当代，荫及子孙，造福人类!

1994年12月9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式下达《国家计委关于三峡工程正式开工的通知》。全文仅70余字，却为三峡工程建设翻开新篇章——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大江截流成功;2003年，三峡工程如期实现蓄水135米、船闸试通航、首批机组发电的三大目标;2012年，三峡工程地下电站全部投产发电……

2020年，三峡工程完成整体竣工验收全部程序。

“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全面发挥。”验收结论如是写道。

从描绘蓝图到完成整体竣工验收全部程序，历经百年，由2700多万立方米混凝土浇筑而成的三峡工程主体建筑物，以横锁大江的雄姿展示着“当惊世界殊”的盛世豪情。

巨川安澜，为长江流域发展带来新机遇。滚滚长江，不尽东流。洪行其道，惠泽人民。

(记者周圆) 新华社北京电